

共和国将帅篇——叶剑英

(下)

黄埔将帅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叶剑英 (下)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 / 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叶剑英 (下)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了，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说：“参座”说得对，我们不要车了。他回去以后，带领部队把警备工作搞得更好了。

军管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就将原北平市主要的党政机关、厂矿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接收过来了。在被接收的单位中，有敌“华北剿总”系统和伪中央系统党、特、军、政等机关，有四大家族掠夺华北人民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各银行在平分行，有华北铁路、邮政、电讯等全部系统；有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兵工厂等重要工业企业，有中外闻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平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还有设备相当完善的十几所医院和卫生研究机关。在被接收的人员中，有职工及一些文管人员、技术人员等九万余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的人员二万三千余人，旧市政府、公安局系统的伪公职人员、警保人员二万五千余人。接收工作后期，对物资进行了清点、分配和移交。对旧人员的处理，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军管会成立了人事处理委员会，制定了处理原则和办法。总的是采取团结、改造、使用的方针，但对不同系统的不同人员又分别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置，使之各得其所。

整个接管工作，进行得稳妥、周到，没有出乱子，没有发生大的差错。这首先是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同时，与市委和叶剑英、彭真等负责同志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紧张忘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中外进步舆论都赞扬北平的接管工作做得好。甚至连国民党统治下的某些报刊也承认：“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在那些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叶剑英除领导进行接管工作外，还和彭真等同志担负着为党中央、毛主席在北平选择办公、居住地点的任务。中南海，就是他们经过多方调查和比较后，留出来给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用的。三月二十五日，叶剑英和在北平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兴奋地到西苑机场，迎接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北平，并陪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

恢复发展生产

“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也就是把一个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这是叶剑英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平市人民政府第一次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直接关系到改善人民生活，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巩固的物质基础的大问题。他在主持市政府工作期间，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的工作任务。

为了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的生 产，叶剑英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认真钻研经济建设和生产问题，循序渐进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初期，主要是向工人群众、向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宣传解释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之明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道理。叶剑英和彭真多次召集公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及各方面的生产人士开座谈会，向他们调查了解生产中的情况，讲我党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对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的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的资方也逐步了解了党的政策，安定了情绪，从而也愿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了。

在动员生产的基础上，叶剑英、彭真等同志领导市政府，逐步对公营企业单位的管理实行民主改革，对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实行调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公营企业生产发展较快，但部分工厂也存在一些偏向，主要是有些工厂负责干部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对待工人，有的用克扣工资、取消工人某些福利待遇的办法来发展生产，还有的高高在上，脱离工人群众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叶剑英和彭真抓紧对干部进行教育，多次召开干部会，报告政策，并及时检查和纠正偏向。同时对干部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学习领导现代化工厂的知识。还注意从有生产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提拔和培养

干部，把他们同解放区来的干部搭配使用。在管理问题上，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这种民主的工厂管理机构来解决领导上的群众路线问题。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广泛宣传党的“四方八面”政策和由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解决的。劳资关系走上了正轨，双方都有了合同的约束，都明白了只有从生产的发展中，才能使双方获得利益，因而纠纷减少了，生产的积极性更高了。

叶剑英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生产的工作中，还抓住了沟通城乡贸易这一环节。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地发展了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市政府所属工商局协助工业会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请华北各地和其它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观，交换各地区的生产经验，了解各个地区对北平市工业产品需求的情形。在展览会期间，市政府并邀请各地的代表，举行了贸易、企业、工商行政、私营工商业等方面的座谈会。叶剑英出席了关于贸易的座谈会，并就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相互关系及贸易工作的重要性，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中，中心工作当然是发展工业。同时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之后，才能供给城市以原料和粮食，才能提高购买力发展市场。在这里，城市必须供给农村以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为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城乡必须互助。工业农业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商业。如果产品没有销路，工农业就无法发展。因此，只有正确地指导商业、贸易，发展商业、贸易，大力扩张销路，工农业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叶剑英的这些见解，对于正确地发展生产具有指导作用。在工业展览会期间，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总值一亿六千万元的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就达到和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北平市生产发展的事实，再一次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不能管好城市”的谰言。

叶剑英在领导市军管会和政府的工作中，身在北平，胸怀解放全国的大局。经常把支援战争、支援我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说：由于

新解放城市需要大批熟悉市政工作的人员，我们从将要南下的野战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北平的接管工作，使之取得接管和治理城市工作的经验，然后随军南下。以后，叶剑英又同军管会、市政府其他负责同志一起，从原市政府旧人员中动员了一批志愿南下的人，从北平一些大学等单位征召了一部分革命积极性高的青年。这些人经过军管会集训以后，由中央统一分派，参加新解放城市和地区的接管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抓紧进行人力支援的同时，叶剑英还从北平调集了大量物资支援了南下作战的野战军部队。

挥师南下

一九四九年秋，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溃退到华南和西南一带，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我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残敌，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敌人，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党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同时确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率，向华南进军。

正在担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受领新任务后，一方面继续参与决策和处理北平市有关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另一方面，开始了紧张的南下准备工作。从进军的时间到战役的打法，从干部的调配到政策文件、材料的研究整理，都要思考，要运筹，要拿出办法。他忙得寝不安席，食而乏味。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问题极为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他告诉叶剑英，这次南下，应先到江西赣州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师，然后举行会议，着重解决好八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人选；第二，解放广东的作战步骤；第三，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第四，各级干部

的配备；第五，做余汉谋等人的工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广东问题；第六，货币政策；第七，对香港的政策；第八，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毛主席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具体的阐述。接着，毛主席又向叶剑英谈到了团结问题，指示他和南下的同志，对原华南分局及各级党委在广东工作的成绩要有恰当的估计，要处理好南下大军、干部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叶剑英向毛主席汇报了南下的准备工作情况，提出干部不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他风趣地说：“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你看怎么办？”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心里明白，主席讲的“泉水”，是指方方领导的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

毛主席一面要求叶剑英自力更生解决干部问题，一面也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力为华南多分配一些干部。中组部从北平、山东、华北军大及一些大学生中，挑选了一大批干部，陆续输送到了华南工作。后来，这些干部在广东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谈话中，叶剑英还向毛主席表示说：我过去长期在军委和主席身边工作，时时得到主席的教诲，工作比较好办。这次到华南，要独挡一面，可能比较吃力。毛主席信赖地说：北平市的接收和管理就搞得不错。广东情况更复杂一些，你去比较合适。你一定能胜此重任。

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谈话，叶剑英心里真象流进了一股清清的泉水。他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一定尽快解放广东，解放华南，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一座巩固的国防南大门。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

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二是，如果敌军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与虎门之间的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

与牵制潮汕之敌。

中央军委收到广东战役计划后，于九月十二日由毛主席回电给叶剑英、陈赓：“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根据这一指示，立即按计划部署了军队的行动。

关于军队的指挥问题，作战会议也进行了讨论。四野总部在七月下旬曾指示，由四兵团军、政首长指挥两兵团的行动。现在，叶剑英参谋长到来以后，两兵团负责人都请他统一指挥。叶剑英考虑到自己是分局第一书记，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地方的事情，便推举陈赓统一指挥两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凡属带方针性问题和全盘计划都提到分局讨论，以取得党、政、军、民的一致配合，不再另组前委。

野战部队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后，叶剑英又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的配合作战计划，并于九月十五日给广东各区党委所属武装下达了任务。叶剑英向各区党委指出：“此次华南作战，是解放华南的最后一战。各地务必在党、政、军、民中，充分动员，做好参战、支前工作。”九月十六日，他主持华南分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对支前的组织领导和征集粮柴草料、民工担架等问题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和部署，对于战役的保障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组织机构和干部的配备问题，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意图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索，并与分局的负责同志们多次商量，确定向中央建议：广东省政府由叶剑英作主席，方方、古大存为副主席；广州市军管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王作尧为副主任；广州由于连日暴雨，平汉铁路的不少地段被水冲坏，叶剑英和随行人员一起，只好先乘车到天津，尔后经徐州、郑州，到达汉口，再乘船沿长江东下，九月初到达江西赣州。

遵照党中央指示，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都陆续于九月六日前到达赣州会师。他们之中有：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

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同志。

叶剑英冒着酷暑到达赣州的当天，顾不得长途奔波的疲劳，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他的提议下，华南分局于九月十一、十六和十九日，召开了三次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解决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华南分局、军区、省市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的配备；二是解放广东的部署；三是接管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政策。会议经过讨论研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分局三次会议前后，叶剑英还主持了作战会议、后勤会议、各种小组会议和全体入粤高干会议，解决了军事行动、后勤供应、支前工作、统一思想团结会师等一系列问题。

解放广东的军事行动，是各项工作中最紧急的问题，叶剑英把它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他与各兵团和两广纵队负责人研究了部队的行动方案。九月七日，他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九月八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将这个计划上报军委和四野总部。

按照这个计划，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的条件。争取和平解放广东，同时准备对付在广州坚守顽抗之敌。在具体作战方案上，根据敌情可能的变化，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如果敌军扼守曲江、英德之线，则我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以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其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华南市政府由叶剑英兼市长，由朱光及一、二位民主人士任副市长；广州警备司令部由十五兵团兼任。其他的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如省政府委员和广州市军管会委员的组成人选，广东各军分区的划分以及广州卫戍部队、警备部队配置，等等，也进行了商议，统一了认识。这些人事安排，都先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赣州会议所讨论和决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集中体现在叶剑英于九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所作的重要报告中。这个报告，在分析了广东的民情、政情和敌情之后，提出了解放广东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一种是和平解决的北平方式。要立足于武力解

决，并在坚决地向敌人进攻、造成军事打击的有利条件的前提下，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同时，要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进行的各种方式的骚扰和破坏，如果它敢于来犯，就坚决消灭它。

叶剑英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团结问题。他希望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他说：“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现在是四面八方的干部会合在一起，有外来与本地干部，有新干部和老干部，有上级与下级干部，有党与非党干部，有军队与地方干部，团结问题特别要注意。一切困难都要靠团结才能克服，一切敌人都在靠我们坚强团结才能战胜它。”会议专门做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一九四六年以来广东及华南各省领导人民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的成绩。

赣州会议在叶剑英主持下，前后历时二十余天，共开大小会议数十次，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在广东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对军队现代化的主张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叶剑英元帅，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职务期间，根据毛泽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总的战略构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卓有成效，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叶剑英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主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以下六个主要问题作一概述。

一、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使两者有主有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防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这是搞好国防现代

化的前提。叶剑英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这样的指导思想：国防建设要以国家经济建设为基础，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总的战略目标。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际，叶剑英针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向中央和军委提出了正确认识 and 处理好“两个关系”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认为，国防力和经济力都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国防建设要服从于经济建设。国家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加速经济建设，将国防费用支出控制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同时，国家经济建设也必须适当照顾国防建设的需要。以后，叶剑英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明确指出，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这个大局，国防建设的速度不能超越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1958年5月，他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决定性的东西是建设现代的工业，现代的农业。工业速度快了，国防现代化速度也就快了。1977年12月，叶剑英再次强调指出，要从全局出发，正确认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加强经济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强调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要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国防现代化提供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在国防建设上，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路子。

叶剑英在1975年、1977年的军委会议上，深刻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不单纯是发展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开发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潜力，增强国防威力。其基本途径就是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路子。在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同时，制定同一时期的国防发展计划。经济区的划分、工业的分布与布局、基本建设的投资、重点项目的建设、工业产品结构 with 产量等等，都要从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的需要考虑；在加强工业建设和技术改造过程中，同时考虑其军事的意义，为战时扩大军品生产奠定新的基础，扩大生产潜力；把推动新技术革命同发展军事技术结合起来，使高技术能够优先使用到军事上，并使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能够尽快地互相转化，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国防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全国和各地区的公路、

铁路、机场、港口和通讯等的建设，都应既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又能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发展，这是一条多、快、好、省建设国防的路子。

再次，在武装力量体制上，必须坚持毛泽东规定的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

国防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力量与后备力量，这两部分都要包括在战略计划里面。在和平时期，常备力量即正规的国防军、值班部队应尽量地、适当地减少步兵，扩大技术兵，特别要加强海空军建设，大力培养这方面的技术力量和人才。后备力量建设，主要是加强民兵的组训。同时发展国防体育，包括无线电、摩托、射击等陆上运动，航海、轮机等海上运动、航海工程，滑翔、跳伞等航空运动，以培养技术后备力量。

叶剑英还认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必须发展先进的国防技术、改善武器装备。为此，要千方百计把科学研究和军工生产搞上去，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防工业生产的原则，应是精密地设计，精密地制作，少量地生产，少量的试用。要突出重点，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来优先发展重点武器装备和新型武器装备；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

叶剑英强调，国防建设要从全方位上加强国防力量，把海防、空防、边防、内防结合起来，使国家的整体纵深防御得到巩固。在重视陆地边防的同时要重视空防和海防，坚决保卫我国的领空和领海。要把人防工作计划纳入国防计划、经济计划。大城市要有周密的疏散计划，解决人民防空问题，准备打巷战（街垒战）、地道战、“坚壁清野”这样的城市保卫战。

二、建立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把提高军队质量摆在首位

人民解放军作为国防力量的骨干和核心，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叶剑英认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心问题是要搞好军队的现代化，提高军队的素质。在 50 年代初期，他就明确提出，提高军队质量，这是我们全党的责任，是建军的首要任务。

组建现代化的统一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叶剑英分析现代战争的

需要和各国现代化军队的现状，从各个方面阐述加强国防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现代战争要求海陆空军诸军种和诸兵种的合同作战，如果没有陆军战役、空军战役、海军战役的结合，整个国家战略指导意图是不能够实现的。他积极参与领导我军逐步由单一兵种型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和过渡，对合成军队的组织指挥、编制体制、政治工作、干部制度，教育训练、行政管理、供给保障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新时期的建军思想。他针对林彪把军队编制搞得很乱，机关、部队庞大臃肿、不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情况，认真贯彻精简整编的原则，坚持“质量为上”，实行“精兵主义”。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强调“兵贵精不贵多”，“必须严格控制军队定额”。并确定主要精简机关，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建设，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他强调“编制就是法规”，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严格把关，严格执行。他十分重视合成军队中司令部首脑机关，强调在思想上、业务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职能和作用，使其成为正规的、能干的领导机关和指挥中心，同时强调，建设良好的强有力的后方勤务的组织体制，使之精干、合理、效率高。

加强现代化军队的政治建设，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叶剑英坚持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一直关注的首要问题。1959年他在为纪念古田会议决议发表3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他写道：“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这些原则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绝不允许凌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他指出，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针对军队中出现的否定党委制，贬低政治工作等倾向，他重申毛泽东

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观点，坚持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原则，要求我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他强调指出，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指导原则不仅是民族范畴的东西，而且是国际范畴的东西，是集中群众智慧的体现。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光辉创造。

三、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要求，叶剑英把军事教育训练工作提到关系我军建设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他在全军重大会议上多次指出，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军事训练是我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部队的各项工作要“以军训为中心”。叶剑英这一思想正确反映了军队建设从战时转入平时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客观要求，明确了军队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提高战斗力的根本方向和途径。

如何进行部队军事训练？叶剑英认为，必须坚持“练为战”的根本目的。要求部队根据实战需要来练兵，为应付敌人使用原子、化学等武器的战争，严格训练部队。抓住现代战争中最经常最重要的课目反复多练，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练兵。加强打飞机、打坦克训练，加强近战和夜战训练。反对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搞“花架子”。叶剑英强调军事训练必须达到“四个结合”的总要求：一是红、专、健结合；二是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结合；三是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四是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他认为这“四个结合”是军事训练的总要求，也是训练工作的总目标。为了达到这个总要求，叶剑英还要求部队树立勤俭练兵思想，从各军兵种的实际出发，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海军要“在港苦练，出海精练”，空军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要“在营苦练，野营精练”。叶剑英还积极倡导改进训练方法，技术训练采取“摸、爬、滚、打”，战术训练采取“抓、钻、探、演”的方法。1963年在他的倡议下，全军普遍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四、准备应付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和平时期，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我们

决不能麻痹。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什么性质和样式的战争？叶剑英指出：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第一是人民战争，第二是现代战争，把这两者用逻辑联系起来，就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战争的本质，现代条件是时代的特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于未来战争，但应根据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剑英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把注意力放在集中研究现代条件下如何打好人民战争上面，提出了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认为，人民战争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个法宝，我们过去依靠它，现在依靠它，将来仍然要依靠它。

如何打好未来的人民战争？

首先，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叶剑英指出：未来反侵略的现代战争从总体上看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争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战争通常由突然袭击开始可能先从后方开始。战场情况变化急剧。战争规模巨大，是诸军兵种协同进行的战争，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民战、总体战、立体战、协同战。我们进行反侵略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也必须充分考虑和适应这些特点，继续运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原则指导战争，并根据出现的新形势和时代特点加以发展。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国家大，作战方向多的特点，一旦发生战争，将是多方面的、大兵团的、大规模的战争，不会是一两次交战，而是通过许多次战役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既要准备在一般山地作战，也要准备在特殊地形条件下作战；既要准备大战，也要准备小打，还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既要准备在我国境内作战，也要准备把侵略者驱逐出我国国土以外作战；既要准备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的防御作战，也要有不同形势、不同样式、不同规模的进攻作战，以及击退敌人后的追击作战。叶剑英还提出，研究未来战争，还必须考虑到国际条件，但基本点应放在自力更生上面；敌人可能使用尖端武器，但基本点应放在我们以常规武器战胜使用尖端武器的敌人；既有速决因素，又有持久因素，但我们的基本点应放在持久方面。

其次，要坚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叶剑英认为，在未

来反侵略战争中，要把积极防御的思想贯穿于作战和战场建设的全过程。他指出：所谓积极防御就是进攻的防御。进攻防御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役战术上的进攻。他说，我们必须训练部队在战役战术上积极进攻，消耗和消灭在我国领土和领空上的敌人，同时我们还必须拥有原子弹、氢弹等现代化的强大武器，以防御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战略上我们是防御的，战役战术上我们是进攻的。他引用“盘马弯弓箭不发”的古典说，我们的态度，不是偃武修文，而是盘马弯弓。只要看到敌人一动，我们就把箭发出去。我们的原则是不打第一枪，不发第一箭，不先发制人。否则政治上就被动。以后，他又提出“不为人先”、“退避三舍”。按照叶剑英的观点，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反侵略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突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着战争的发展，有计划的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要搞好重要城市的设防和堡垒地带的建设，同时要搞好在重要方向适当纵深地区的预设战场的建设，形成积极防御体系。要处理好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的关系。战略防御乃是在一定时期内，某战区或一战略方向上，为达成疲惫、削弱、迟滞、阻止敌人进攻，争取时间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所采取的一种行动类型。战略反攻乃是进攻的特殊类型，只有顺利地进行战略进攻，才能击毁敌人的武装力量，达到战争的目的。

第三，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叶剑英强调，要弄清战争战略和政略的关系，使战略服从于政略。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下定决心、指导战争的法宝。他认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仍是现代战役的根本目的。为此，要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要使用主要兵力进行集中突击；主要突击力量要指向敌人防御比较薄弱的地区；坚持创造战场原则，要创造有良好的群众条件和交通、工事条件的预设战场和战役布势；要坚持协同原则，搞好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保证对军队进行确切而又不间断的指挥；还要研究原子武器对现代战役的影响及抗登陆战役、渡海登陆战役、城市防御